

《阅微草堂笔记》文体性质探究

陈倩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摘要:《阅微草堂笔记》作为一部融志怪、考证、著书诸特质于一身的志怪小说集,集合了纪昀的学术考据成果与个人情感及观点表达,是一部以学术思维写就的具有鲜明学者气质的小说集,具体表现为以考据之法写小说、以志怪内容说学理、以著书立言为旨趣,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学者创作小说的手法和以小说“载道”的文学理想,其面貌之驳杂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政治环境及纪昀的学者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纪昀;文体

中图分类号:I24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1-0059-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1.009

Study on the Genre Nature of *Notes about Yuewei Caotang*

CHEN Qi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Notes about Yuewei Caotang* is a collection of fantastic tales encompa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hosts and monsters, historical records studi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which embodies Ji Yun's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expression of his emotion and opinions. It is a novel with distinctly scholarly quality written with academic mind, which is embodied in writing novels with examining facts, interpreting academic knowledge with ghosts and monsters,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ideas with book style. It typically reflects scholar's approach to fiction writing and the literary ideal of "carrying the knowledge" through fiction. The complex textual fo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at time and to Ji Yun's identity as a scholar.

Key Words: *Notes about Yuewei Caotang*; Ji Yun; genre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阅微》)由《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组成,从各卷卷名即可见其内容大体为各地街谈巷闻及奇闻轶事,具有明显的消闲娱乐性质。纪昀于《滦阳消夏录》小序中有言:“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1]

此亦印证了其作此书时轻松愉悦之心境。但身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创作《阅微》时不自觉地融入了学者匠心,表达了其个人学术及政治见解,使文本具有严肃的思想底蕴,其内容旨趣与写作方法均不同于一般的志怪小说,显示出学者思维对其小说面貌的影响,具体体现为:以考据之法写小说,以志怪内容说学理,以著书立言为旨趣。

作者简介:陈倩(1997—),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目前学界在研究《阅微》的文体问题时,或引发关于小说概念界定的争论,如张泓认为在探讨《阅微》文体性质时,应注意厘清西方小说观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观的界限^[2];或旁及《聊斋志异》,探讨二者在笔记体与传奇体两种小说文体上各有侧重的努力^[3]。当今学界多致力于给予《阅微》一个清晰绝对的文体定位,而忽视其文本自身之驳杂面貌以及复杂的创作背景和纪昀学者身份对小说面貌应有之影响。学界多从纪昀“文章各有体裁,亦各有宗旨,区分畛域,不容假借于其间”^[4]¹⁴⁹之语入手,将《阅微》的文体界定局限于笔记小说或志怪小说的框架内。事实上,文体之界限难以绝对划分,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是正常的文学现象,蒋寅在《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中已揭示古代文学作品中雅文体向俗文体渗透的现象^[5],以之观照《阅微》中学者思维对小说的渗透,或是雅文学向俗文学渗透的另一种形式。文体之界定本身困难,学界目前对文体的界定也主要以文本的主体特征为判定标准,如石昌渝在界定《聊斋志异》之文体时认为:“《聊斋志异》的主体部分却不是笔记小说,或者说它有笔记小说之形,而无笔记小说之神。笔记小说的灵魂在于实录,因为实录,它才具有补充史传记载之空缺的价值。”^[6]²¹³以《聊斋志异》缺乏实录精神、多虚构之辞的特质而将之界定为“用笔记小说文体写传奇小说”或“笔记体传奇小说”^[6]²¹⁵,亦是把握住了《聊斋志异》的主体特征,但这并不能否定《聊斋志异》中存在文体互参的复杂面貌。同理,陈文新认为纪昀“既注意与史家纪传划清界限,也注意与传奇小说划清界限”^[7]。事实上,这种有意的“划清界限”并不能抹杀《阅微》与此二者之间的某些共性,从文本的主要写作方法来看,《阅微》小说笔法与考据之法兼备;从主要写作内容来看,《阅微》既有灵异玄幻的鬼狐故事,又有真实感人的个人纪事,因而其文本仍具备重实录的史乘特质与崇尚异的传奇小说特征,如齐心苑所言:“纪昀专一于笔记式表述,将志怪、志人、诗话、考证等收纳在笔记之内。”^[3]纪昀所反复强调的体例专

一,在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实则体现为一种有限的统一。学界目前对于《阅微》“笔记体”的把握抓住了《阅微》文本的主体特征,但还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应在重视及正视《阅微》文本复杂情况的基础上,对《阅微》笔记文体的内涵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丰富。作为融合学术品格与志怪小说创作实践的产物,《阅微》当为一部兼具学术性(包含知识性、思想性、征实性)与志怪性的具有个人著书性质的复合性笔记作品,是纪昀以小说“载道”实现其文学理想的成功实践。

一、写作方法:小说笔法与考据之法并用

《阅微》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自有小说应有之要素,具备基本的情节框架及人物,但其情节的完整度与人物形象的丰满度均与《聊斋志异》有较大差距,许多故事仅是粗略勾陈梗概,短小的篇幅也不可能为创造经典人物形象和铺展情节留下足够空间,是以整体风格更接近简朴精悍的汉魏六朝小说。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全书》编修官们在《小说家类》小序中表达了他们编选小说的标准:“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谰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8]可见纪昀等人所认可的是具有一定教化意义且文风质朴真实的小说,而否认那些失真虚构的故事,其真实性又是立足于见闻和考证,体现了宗汉思想对于学者创作、编选小说的影响。纪昀还指出:“今燕昵之词、嫖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1]³⁵³可见他对唐宋以后细微曲折的小说笔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大量藻饰抹杀了小说的真实性。同时,纪昀还追求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等人“简淡数言,自然妙远”的艺术境界^[1]²⁶⁸。凡此种种,都显现了汉魏六朝小说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汉人不仅在学术上重考据方法,而且在小说领域也重视信息的真实性,以如实搜集、记录街坊异闻的创作方式为主。魏晋亦承汉人小说

观念,干宝《搜神记》序言有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9]这显示了干宝著书之信实原则,可见汉魏六朝人自视为故事的忠实记录者而非创作者。纪昀的小说观念承自汉魏,他不仅在学术上支持汉学,在小说领域也追本溯源,奉汉魏六朝小说为经典,因而其故事继承了汉魏六朝小说粗陈梗略、信实简约、篇幅短小、尚实黜华的特点。如《滦阳消夏录》(三)中记载荔姐为摆脱歹人纠缠,装作缢死鬼吓退歹人却致歹人疯魔的故事^{[1]32},纪昀只是如实记载所闻,并在故事结尾以三个“或”字对歹人疯魔的原因作了几种猜测却不给予定论,体现了其征实的创作原则。同时,《阅微》的选材显现了纪昀作为小说家的猎奇心理,搜罗奇闻轶事、记录奇珍异宝是其著作的主要内容,对罕见、奇异之事的关注也显现了他身为学者的探究心理。在记录这些故事时,他亦常运用考据之法,显现出其学者身份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其考据对象包含地理人文、名物器具、历史掌故,取材甚广。如《姑妄听之》(三)中有一则材料对玉器的雕刻方法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世谓古玉皆昆吾刀刻,不尽然也。魏文帝《典论》已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汉时已无此器。李义山诗:“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其地即佛经之印度,《汉书》之身毒。精是技者,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颇有中国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旧谱也。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故细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尝见玛少宰兴阿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虬干夭矫,殆可以插瓶,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虽细条碎瓣,亦皆空中。^{[1]319}

这则材料运用典籍、诗歌、传闻及亲身见闻等多种方式考证古代玉器的制作工艺,中间又有作者自身的推理分析,俨然考据学家的语气。

总体而言,《阅微》是一部承接汉魏六朝小说观念的著作,既有志怪小说尚奇好异的特点,

又继承了汉魏六朝小说信实简约、尚实黜华的特质,同时在具体故事的阐述中还糅合了考据的治学方法,其独特的创作方式虽未能摆脱宗汉倾向的影响,但亦是清代学坛复古思潮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具现。

二、内容旨趣:志怪与著书立言并存

(一) 志怪

《阅微》虽名“笔记”,但主体部分多为以笔记体书写的具有完整情节的小说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将《阅微》与《聊斋志异》统归为拟古派小说^{[10]310},以《聊斋志异》为拟唐传奇狐鬼之文、《阅微》为追踪晋宋志怪之书,可见他是承认《阅微》的小说文体的。但小说自身的定义已足够复杂,历来众说纷纭,从何种层面进行分析,对于厘定《阅微》的文体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0]64},“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10]65},认为唐传奇有意增饰之文字为小说有意创作之始,而唐传奇出于志怪之处正在于藻绘与虚构,即“意识之创造”^{[10]65}。石昌渝则强调古小说的史乘性质,他认为“古小说在性质上与杂史杂传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者在它的篇幅和体例”^{[6]108}。东汉班固有言:“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1]虽为“道听途说”,亦已道出小说的实录特质。唐代刘知几亦认为“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12],承认了小说与正史之间相互参看的作用。明人陈言亦云:“正史之流而为杂史也,杂史之流而为类书、为小说、为家传也。”^[13]可见小说之“史乘”源流论并非孤论,石昌渝所言“传统目录学所指的‘小说’都不容许内容有虚构……都必须是实录”^[14],亦是立足于前人之言。而《阅微》文本之“实录”特质正是纪昀追随汉魏六朝古小说精神的成果,亦反映出他身为官修图书编修官之自觉求实精神。

《阅微》主体秉持“实录”原则记载,并间以考据之法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这一观点已十分具有说服力。但其中的狐鬼故事仍具有虚构的

嫌疑。笔记的精神在于实录,传奇的精神在于虚构,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区分纪昀创作时是有意虚构还是无意虚构,不仅关涉《阅微》的文体问题,亦关涉纪昀本人的鬼神观。

《阅微》作为一部承接了汉魏六朝小说观的志怪小说集,以狐鬼故事为主体展开,包罗公案、男女恋情等多种类型故事,但对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始终不予定论,这正反映了纪昀身为学者的理性思辨。作者在书中对鬼神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如《滦阳消夏录》(四)首则故事中的狂生对鬼神的态度由“江湖游士,练熟手法为戏尔,岂有真仙日日听人呼唤”转至“鹄立案旁,殆无人色”,且“后岁余即下世”^{[1]45-46},显现了扶乩的神异结果,增添了鬼神存在的可信度,书中种种“果报”故事似乎更是暗示了鬼神的真实性。但亦有部分故事显示出对鬼神存在的怀疑态度,纪昀对扶乩一事亦云:“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灵耳。”^{[1]46}在这里他看到了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即使有鬼神,也是“借人之精神”“待人而灵”,体现出身为学者的清醒意识和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与儒家对鬼神的矛盾态度一脉相承。袁枚在《子不语》序言中说道:“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然龙血、鬼车,《系词》语之;玄鸟生商,牛羊饲稷,《雅》《颂》语之;左丘明亲受业于圣人,而内外传语此四者尤详。”^[15]这些儒学经典都有对于鬼神、祭祀等的记录,可见儒家经典与志怪传统的渊源由来已久。儒学经典尚且不能完全不语鬼神,在后世儒释道合流与政治神学兴起的背景下,儒家学者就更加难以挣脱鬼神观念的影响,如此,纪昀身为儒家学者大谈鬼事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阅微》中的狐鬼形象与《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形象大有不同,《阅微》继承汉魏六朝小说短小精悍的特点,人物形象的塑造明显逊色于《聊斋志异》,且纪昀的学者身份亦使得他的笔力更多趋向于理性的思辨,而蒲松龄下层文人的身份使得他更加倾注心力雕刻小说的精彩之处,着力刻画人物形象,因而其笔下的狐鬼形象也更加立体可感、富有人情味。

再者,《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形象常常是美好的象征,大多具有善良的品格,是某类正面人物的化身,被赋予了人性的温度,“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是鲁迅给予的一针见血的评价^{[10]194}。而纪昀在《阅微》中刻画狐鬼不为塑造某个特别的形象,而专求阐明某种道理,因而他笔下的狐鬼形象更多地带有客观的疏离感,狐鬼神成为惩戒恶人的工具与表达观点、探求真理的媒介,成为一种缺乏人情味的工具性的存在。或许我们无法明晰纪昀是否相信鬼神的存在,但无疑,他对鬼神的形象存在一种合理利用的文学实践行为。《易经·观卦》早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之语^[16]。桓谭有言:“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7]此语揭示了小说与教化之间的关系,其所谓“丛残小语”,已颇为接近笔记体琐碎记录的特点,“治身理家”则凸显了“小说”的实用功能,与儒家学者著书补益人心之理想相呼应。纪昀《郑编修(际唐)出其曾祖赐硃见示敬赋古诗二十六韵》亦言:“著书宣教化,是亦儒臣事。仰惟赉予心,实功风俗计。”^{[4]510}可见其笔下之狐鬼,实乃教化与代言之鬼,其狐鬼形象亦包含其以神道设教之私心与著书立言之理想,凸显其儒家学者品格。

综观《阅微》中的狐鬼事件,有几种类型的狐鬼形象尤能代表纪昀的学者思维。一是施行惩戒与报恩的狐鬼,客观上起到了震慑恶行、鼓励善行的作用,体现了作者发挥文字教化功能的心愿。二是探讨知识、学术的才鬼与儒狐,这种狐鬼形象是清代学坛追求智识主义的“道问学”倾向的具现,作者借狐鬼之口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客观上比自己言说更具说服力,如《滦阳消夏录》(四)中就借守藏神之口辨析儒释道三教的不同以及合理利用三教的方法^{[1]59},实则是作者自身观点的表达。三是作诗论文的狐鬼,如《滦阳消夏录》(三)中记载秋谷先生与精魅应酬答对、精魅评议渔洋先生诗歌的故事^{[1]42},精魅滔滔不绝的论述又何尝不是作者自身观点的映现呢?后两种狐鬼形象具有学者

与文人气质,体现了作者学者身份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二)著书立言

《阅微》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著书立言倾向,王昶以《四库全书》的“子部杂家”类为突破口,指出《四库全书》将大多数笔记归于“子部杂家”,“其性质属于学术性较强的著书立说一类”^[18]。纪昀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将自己所作小说以“笔记”命名,或许亦显示其立言倾向。纪昀门人盛时彦在《阅微》序言中说道:“文,其道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为诸子之书。”^{[1]序1}论述了“文以载道”在各种文体中的普适性,各种文体均能用以寄寓大道、补益人心。他又指出:“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1]序1}又于《盛跋》云:“时彦尝谓先生诸书,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诫,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于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1]353}此印证了王昶所言的学者以笔记著书立说之观点。从结撰文章的方式看,《阅微》中的短篇故事明显体现了学者严谨的为文章法,许多故事遵循着由故事至分析再至结论的结文框架,议论成分在整篇故事中的比重远大于《聊斋志异》,与之相比更似一篇篇学者之文。近代刘声木认为应把此书“不当作小说看”^[18],这主要是立足于小说的虚构性而言的,身为学者的纪昀在创作小说时仍保持着严谨的学者特质,所述皆所闻,所进行的评论分析亦有根有据,或有严谨推理过程,或有典籍为依据,或有他人人口述为证,充分体现了学者为文的严谨性,对于自己不清楚的内容,常用“不知”“无从而探究”等词一笔带过,或提出几种推测而不妄下结论,如《滦阳消夏录》(一)中记载一乡间小儿作诗的故事,针对“怪村竖哪得作此语”的异事,纪昀只是作出“不知神仙游戏,抑乡塾小儿闻人诵”的推测而已^{[1]9}。《滦阳消夏录》(五)提出了对狐狸幻化之事的哲理性思考:“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视之如真,不知狐自视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视之,更当如

何。”^{[1]72}而《姑妄听之》(一)又再提此事:“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视如何,其互相视又如何,尝于《滦阳消夏录》论之。”^{[1]278}并如实记录了其思考此事时的整个逻辑思维变化过程,他跳脱故事本身而探究狐鬼幻化背后的逻辑漏洞,充分体现了学者严谨的辩证思维能力,而两次提及此事则体现了其身为学者对哲理性问题的执着思考,趣味性与哲理性兼具。

除了抒发个人学术性见解,纪昀还在书中评议诗歌,如《槐西杂志》(二)中他对《李芳树刺血诗》进行评议:“爱其缠绵悱恻,无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馆吏录出一纸,久而失去……沈湮数百年,终见于世,岂非贞魂怨魄,精贯三光,有不可磨灭者乎!陆耳山副宪曰:此诗次韩蕲王孙女诗前;彼在宋末,则芳树必宋人。以例推之,想当然也。”^{[1]198}他不仅表达了对这首诗的喜爱,同时对此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据和推测,展现了自己的推理过程,体现了其身为学者的雅趣。

《阅微》作为笔记体小说,多收录见闻,有相当一部分故事带有作者个人生活的印记,其中既包括作者亲身见闻,也包括家族传闻,还有一部分是门人故旧所闻。书中多处记录家族轶事,表达其追忆家人的个人感情,如《滦阳消夏录》(六)中记载了先祖已故原配夫人由于担心继配夫人不知如何料理家事而现身指导的故事^{[1]84},体现了先祖母对家人的温情照拂。书中这类追忆性家事的记载与志怪相结合的故事,更增添了一种虚幻缥缈的温情与伤感,这大概也是《阅微》最富有人情味的部分。书末还收录了纪昀亡故儿子的遗作《纪汝侏六则》,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与追忆,颇具感情色彩。这部分带有个人生活史、家族史性质的书写,成为追忆录式的存在,包含了作者对往事的回味、对亲人故旧的追忆等诸多复杂心绪,温情脉脉,具有浓厚的个人著书色彩。

三、文本面貌成因: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

《阅微》作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彼时的学

术环境与政治环境都对这本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学术环境来看,乾嘉之际,以乾嘉学派为核心的汉学家和以桐城派为核心的宋学家再度掀起学坛的复古思潮,他们因有不同的师法对象而长期处于互相攻讦的状态,即“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槐西杂志》(二)中所记述的“忽旋风滚滚,自东南来,中有十余鬼,互相牵曳,且殴且骂。尚能辨其一二语,似争朱、陆异同也。门户之祸,乃下彻黄泉乎”^{[1]197}反映的正是当时学坛学术争端的一个侧面。朱陆之争与汉宋之争在本质上呈现着“尊德性”一端退让、“道问学”一端前进的演进过程,《四库全书》的修订体现了乾隆皇帝对“道问学”一端的再度加码,自此,主张学问与考据的汉学家逐渐在学坛取得压倒性优势,而纪昀身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亦将汉学奉为经典,以考据为治学方法,与乾嘉学派为伍,因而他的《阅微》一书处处显露考据之法与学者气质。有人认为《阅微》一书的文学性较差,逊色于《聊斋志异》,这是情有可原的。作为小说,《聊斋志异》承袭唐宋传奇而来,沿袭了唐宋以后小说创作人物更加丰满、情节更加完整的特点,是文言短篇小说趋向成熟的代表作;而纪昀师法汉魏六朝小说,追求简淡质朴的文风,其文学性自然不如《聊斋志异》,纪昀本人亦曾说“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1]353}。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性本身不是纪昀创作《阅微》的追求。一方面,康熙皇帝谕旨早已言明“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19],作为宋代文学主流的词亦遭到康熙帝的嫌弃,更遑论小说了,至乾隆时期,重经文轻文学愈加成为整个学坛的风气指向。另一方面,纪昀身为乾隆时期主持修撰《四库全书》的大儒兼达官,所关心的是为文“文以载道”的特质及其教化功能,而不在于小说的文学性。首先,纪昀多用《阅微》中的狐鬼事件影射现实,包括对传统美德忠孝的肯定以及对丑恶行径的否定。纪昀门人盛时彦在此书序言中便总结道“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1]序1},呈现出劝善书的性质。其

次,纪昀作为汉学的坚定拥护者,与乾嘉学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思想主张与乾嘉学派多有相通之处,包括宗汉学、尚考据,对宋明理学颇有微词,因此他多借狐鬼故事来表现对汉儒的肯定和对宋儒的批判。如《滦阳消夏录》(一)中经香阁一节花费大量笔墨对宋儒和汉儒进行比较,对二者的缺失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析^{[1]8},充分反映了当时学坛汉宋相争的面貌。又如《滦阳消夏录》(四)中写到鬼怪对侈谈程朱理学的官员的批判:“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1]53}借鬼怪之口来批判灾难当前泛泛空谈理学而无所作为的宋学官员,从而揭露宋学脱离实际、于现实问题毫无助益的空疏本质。最后,纪昀的叙述口吻较为冷静客观,与读者之间有一种间离感,故事结尾常附有理性评价,即使是男女恋情之事,也无旖旎之色,纯是情理关系的客观探讨,这也减弱了其故事的人情意味与娱乐性,而增添了说理的严肃性,彰显出其以小说“载道”的创作理想。

《阅微》中对考据之法与实录原则的重视实则反映了以纪昀为代表的历代儒家学者对小说实用功用的共同认知,此点从宋人小说创作中已见端倪,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载《宋人小说类编》中有言:

其中尤多引证假借之处,及旁征博引者,我人穷毕生之力,亦难测其涯岸,登其堂奥,是则虽读宋人小说,藉知某时有某某等人作某某等事矣。恒苦不知其来源,不究其真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则读尽千书,诚何用哉?于是有会心人也,不惜苦志参摩,搜罗古今史牘,考证标识,事事物物,必究其源,必穷其竟,必求其真,使后世读宋人小说也,而恍然于说部之议,非但未可厚非,抑且有经世之学,治国之兴,知随在而有学问,随在而有知识。^[20]

可见宋人创作小说时已秉持求真求实的实录原则与溯源考据意识,对小说的知识性与学

理性颇为重视,昭然学者气质。而纪昀对于《阅微》得意之处,恐怕也在于议论与义理之处。

从政坛环境而言,纪昀所处乾隆盛世正是有清一代文字狱最盛之时。邓之诚《清代文字狱简表》收录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文字狱案共计82起,其中顺治年间2起,康熙年间2起,雍正年间4起,乾隆年间竟独占74起,当为有清一代文网最密之时^[21]。《清代文字狱简表》与《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均集中于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者所收案件虽略有出入,但从分布时间来看,均可得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时值四库馆开馆)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网最为密集、文字狱数量最多的结论,而此正为《四库全书》编纂的主要时间段。从具体数据来看,《清代文字狱简表》所录乾隆朝74起文字狱案件中就有48起发生于这段时期^[21],《清代文字狱档》所录68起文字狱案件中则有44起发生于此间^[22]。事实上,《四库全书》筛选书籍之过程亦是销毁禁书、制造文字狱之过程,其中所牵涉文人之多、手段之残酷为历代所少见。纪昀作为《四库全书》总纂官,地位虽高,但处境亦不容乐观。天骥《清代外史》载乾隆叱责纪昀之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23]可见当时文人处境之艰。纪昀亦常于家书诗文中自叹高处不胜寒之感:“俯见豺狼蹲,侧闻虎豹怒。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置身岂不高,时有蹉跌虑。徒倚将何衣,凄切悲霜露。微言如可闻,冀与孙登遇”(《又题秋山独眺图》)^{[4]476},显示出其对于波谲云诡政坛之恐惧及自身处境之忧虑;“盖身为言官,不言则溺职,言多则必败,绝无保全之法也”(《稟胞叔仪南(报告漏言获谴)》)^[24],表现出其在尽责与全身两难境地之间纠结无奈之心境;“岁岁容看温室树,惟应自戒口如瓶”(《赐硃恭纪八首》其七)^{[4]470},则是其最终选择的处事之法。总之,“不敢言”实乃当时朝堂之群像,而非纪昀之个人选择。

《阅微》始作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此

时文字狱方歇,文网渐弛,但纪昀在创作中仍十分小心,只敢于“实录”性文字中潜藏机锋,借狐鬼之怪来议论社会现象、抒发学理性见解,将朝堂之不敢言以小说与杂书的形式隐晦地传达出来。虽然此书处处充满纪昀个人意志的表达,但他始终不愿以“著书”称之,而反复称之为消闲之书,如《滦阳续录》小序所云:“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滦阳消夏录》等四种,皆弄笔遣日者也。”^{[1]354}其间或许有自谦之意,又或许为全身之计,皆以不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为目的。《阅微》之“实录”性质既是纪昀自身坚守考据治学的学术选择,又是其潜藏自身机锋的帘幕,“实录”性文字之下与狐鬼怪谈之中包含了社会百象与纪昀的真知灼见。鲁迅认为纪昀“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10]198},《阅微》“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10]198},由此实已可见其著书立说之性质。

四、结论

《阅微》是一部带有学者气质的文言志怪小说,纪昀的学者身份及乾隆时期的学术风气都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既具有笔记小说的消遣娱乐性质,又不乏严肃的思想内涵;其小说的特质主要来源于汉魏六朝小说观念,汉魏六朝小说征实的原则又与其身为学者的信实原则不谋而合,考据之法的运用又进一步加强了其小说的征实特质,纪昀与乾嘉学者相近的宗汉倾向使其摒弃了唐宋以来日趋成熟的委婉细致的小说笔法,而师法汉魏六朝,这不仅是当时学坛宗汉倾向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亦是其学者身份作出的选择。作为志怪小说,不离狐鬼故事,但狐鬼故事的虚构性如何与纪昀身为学者的信实原则相调和,显示了纪昀对虚实的把握和对小说创作的理解。在书中纪昀并没有对狐鬼的存在与否作出定论,他只是将狐鬼作为其结文必备的工具性存在,是其表达观点的媒介,显示出儒家一贯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及对不清楚之事不妄下结论的严谨学者特质。再者,纪昀笔下的狐鬼亦探讨学术、作诗论文,显示出学者气质,亦是纪昀学者身份

在小说中的映现。除此之外,纪昀还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情温度的亲人鬼魂,写亡故之人的鬼魂对在世亲人的照拂,充满了浓厚的个人笔记色彩,显示了其私人化著书倾向。

总而言之,《阅微》是当时学术环境、政治环境与纪昀学术思维相互碰撞的产物,鉴于其写作方法与写作内容之复杂性,或许不应将之视为单纯的志怪小说集。作为个人著述而言,《阅微》是纪昀个人话语表达的集成,是纪昀以小说“载道”创作理想的成功实践,为当时晦暗的政坛开辟了一条抒发个人观点的言路,因此通过研究《阅微》,可探究纪昀个人的学术观点、政治理想与小说观念。作为“史”的一部分,《阅微》可补足纪昀生平事迹及当时社会的相关史实,其中的考据之作亦增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作为小说发展史的一部分,《阅微》接续了古小说写实的传统,并在“文以载道”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高扬以小说“载道”的文学理想,将小说创作与学术品格相结合,以蒋寅“以高行卑”之论^[5]来看,这或许在客观上提升了小说作为低位文学的“体位”,显示出纪昀身为大儒不甘仅作调笑作品的品格,亦为清代日渐式微的文言小说创作提供了一条崭新的发展路径,为后世学人的小说创作实践提供了典范。

参考文献:

- [1]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 张泓.《阅微草堂笔记》文体辨析[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2):97-102.
- [3] 齐心苑.《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比较论[D]. 济南:山东大学,2017.
- [4] 纪昀. 纪晓岚文集:第1册[M]. 孙致中,吴恩扬,王沛霖,等,校点.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 [5] 蒋寅. 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体位定势[J]. 中国社会科学,2008(5):149-167.
- [6] 石昌渝. 中国小说源流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 [7] 陈文新.《阅微草堂笔记》:一个经典文本和一种小说类型[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0(2):66-73.
- [8] 曾枣庄. 中国古代文体学:附卷3[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45.
- [9] 干宝. 搜神记[M]. 汪绍楹,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9:2.
- [10]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1]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39.
- [12] 刘知几. 史通通释:上册[M]. 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73.
- [13] 陈言. 颖水遗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1.
- [14] 石昌渝. “小说”界说[J]. 文学遗产,1994(1):85-92.
- [15] 袁枚. 子不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
- [16]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60.
- [17] 桓谭. 新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69.
- [18] 王昕. 论乾嘉学风与志怪“小说”:以《阅微草堂笔记》为线索[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57(5):120-132.
- [19] 清实录:第4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5:572.
- [20] 秦川.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0.
- [21] 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卷5明清中:第1分册[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109-135.
- [22]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清代文字狱档[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952-957.
- [23] 天峨. 清代外史[M]//辜鸿铭,孟森,等. 清代野史:第1卷. 成都:巴蜀书社,1998:92.
- [24] 纪昀. 纪晓岚家书[M]. 江不平,校订. 上海:中央书店,1937:18.

(责任编辑:冯兆娜)